

马克思与当代世界

魏小萍 主编

MARKS AFTER MARXISM

THE PHILOSOPHY OF KARL MARX

马克思主义 之后的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

〔法〕汤姆·洛克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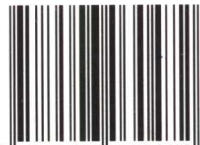
杨学功 徐素华 译

东方出版社

MARX AFTER MARXISM
THE PHILOSOPHY OF KARL MARX

马克思主义之后的
马克思

ISBN 978-7-5060-3047-2



9 787506 030472 >

定价：25.00元

马克思与当代世界——魏小萍 主编

MARX AFTER MARXISM
THE PHILOSOPHY OF KARL MARX

马克思主义 之后的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

[法] 汤姆·洛克曼 著

杨学功 徐素华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装帧设计:曹春

责任校对:王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

[法]汤姆·洛克曼 著 杨学功 徐素华 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060-3047-2

I. 马… II. ①洛…②杨…③徐…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3534 号

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

MAKESIZHUYI ZHIHOU DE MAKESI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

[法]汤姆·洛克曼 著 杨学功 徐素华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45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047-2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20 世纪末,一方面通过传统社会主义在苏东遭受的挫折和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展开,人们从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中看到了问题的存在;另一方面通过当代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理念及其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人们看到,这些变革与资本主义固有的市场激励制度相结合赋予了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活力和韧性。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程度和规模虽然随着苏东剧变有所递减和缩小,不过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自身理念的一部分而存在并将继续为新兴的资本主义所效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并将继续缓解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社会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在继续扩大,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使得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全球范围以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方式继续存在和发展,故寻找不同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发展模式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向往。

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开拓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马克思研究新时代,这一时代以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反思和再思考为自己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研究新时代的主要特征:

第一,将马克思思想与其继承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与其

最亲密的同时代合作者恩格斯的思想区分开来。这样的区分并非刻意地去制造什么对立说、差异说,而是出于对理论、对事物本身进行准确、深入研究的需要。当然这样的区分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历史有关;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普遍真理的普及性宣传过程中,被人们所熟知的是那些高度抽象出来的所谓基本原理、规律,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思想的探索性、研究性过程被忽视。

第二,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反思。无论人们如何理解 20 世纪大规模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实践为人们反思和认识马克思思想、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范例,并成为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思想、理论的不可忽略的历史契机。

第三,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不同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比对和分析研究。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研究方式。马克思本人研究思路的独特性与其理论的形成正是通过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领域,对当时占据着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等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批判而形成的。如果说今天在西方世界占据着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等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当时的主流理论、观点的延续,那么,今天对其进行对比、批判性研究的意义绝不会比当年有所逊色;今日西方世界的理论、观点既是当下时代境遇的产物,又可以视之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它所体现的问题既有现实性、也具有历史性;离开这种对比、分析和批判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会在离开理论对立面、离开理论发展的历史环境下唱独角戏,所谓的“实践”便会沦为无所不能的遮羞布。

我们所选择的这套丛书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西方世界马克思研

究的这些新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到来,全球所面临的基本社会问题也就越来越具有相似性,因此,西方马克思学者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也就越来越具有借鉴价值,如何借鉴、批判他们的研究、思想,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判断。

把握时代脉搏、追踪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最新进展、最新动态是我们选择和编辑这一套翻译丛书的基本宗旨,它也因此将是一套开放性的系列丛书。我们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并向我们推荐符合我们宗旨的最新书籍。

魏小萍

2007年12月28日于阿姆斯特丹

我感到马克思理论中有些论断很离奇……我完全不能肯定我正确理解了这些论断,在我看来它们似乎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论断,倒更像是晦涩的黑格尔派哲学的结晶,而马克思正是从黑格尔学派中毕业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世界观问题》

卡尔·马克思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个人,他声称自己使社会主义成为了科学;他比任何人都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运动,通过对人的吸引和排斥,支配了欧洲近期的历史。我打算把他仅仅作为一个哲学家……来论述。在这一点上,他是很难归类的。从一方面看,他跟霍治司金(Hodgskin)一样,是哲学上的激进主义的一个结果,继续它们的理性主义和对不切实际的空想的反抗。从另一方面看,他又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复兴者,给予唯物主义以一种新的解释,使之与人类历史有了新的关联。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是大体系构造者中的最后一个,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相信可以用一种合理的公式来概括人类的进化。

——贝兰特·罗素:《西方哲学史》

当今在世最伟大的,或许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家……马克思博士……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辛辣的机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莫泽斯·赫斯1841年9月2日致小说家

伯索尔德·奥尔巴赫的信

缩 略 语 表

- B 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T. B. Bottomore(波特摩尔)翻译并编辑,有 Erich Fromm(弗洛姆)写的新序言,New York: McGraw - Hill, 1964.
- C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按卷次引用。
- G 《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Martin Nicolaus(马丁·尼古拉斯)翻译并撰写序言,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
- GI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第二、第三部分节选及补充文本, C. J. Arthur(阿塞尔)编辑并撰写导言,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 M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David McLellan(戴维·麦克莱伦)编辑和翻译,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 MEW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Berlin: Dietz Verlag, 1956;按卷次引用。
- N 卡尔·马克思,《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草稿),Martin Nicolaus(马丁·尼古拉斯)翻译并撰写序言,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和 the 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评论)联合出版,1970。

译者的话

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不仅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遭遇重大挫折,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危机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等等喧嚷,一时风起云涌,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情势下,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的研究趋向:把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回到马克思”本身,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彰显其思想的当代价值。这是苏东剧变后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采取的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策略多少存在着一些不谋而合的共同之处,其共同点就是:撇开由于各种政治原因而附加的因素,直接面对马克思的文本。

我们翻译的洛克曼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一书,就是这种研究趋向的代表作之一,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国内学界也多有评介。该书写作的背景和意图,作者在应我们之邀而撰写的“中译本前言”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我的书写于这样的时代:伴随着苏联解体,包括西方大多数‘官方’马克思主义形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急速地、不可逆转地衰落下去。在那时看来,至少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似乎不仅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本人都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由于我当时认为并且至今仍然认为,马克思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我写作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唤起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特殊重要性的关注。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我强调马克思与以恩格斯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观点上的决定性差异,进而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之间的差异。同时,我强调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应该通过阅读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而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通过马克思主义来进行。”

基于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作者在书中对马克思的众多文本,诸如《博士论文》、《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一一作了重新梳理和解读,并围绕几个专题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因此,无论是对于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趋向来说,还是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和马克思思想研究而言,本书对于我们都是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当然,我们翻译这本书,并不表明我们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及其研究策略,更不代表出版者的立场。相反,我们对包括本书在内的,试图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严格界划开来的研究趋向,是颇有疑虑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苏东剧变之后,“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恢复马克思”等等,类似的提法不绝如缕,已经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研究潮流。“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或“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恢复马克思”,这个提法本身就暗含了如下的预设:“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或者至少,“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马克思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不是一回事。恰如作者在本书中所言,通常人们对马克

思的理解是从马克思主义入手的,而马克思主义对于不同的应用者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它是一系列理论的集合,这些理论主要不是基于马克思,而是基于恩格斯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洛克曼这本书出版的2002年,伦敦经济学院的美格纳德·德赛(Mgnard Dersay)出版了《马克思的复仇》(*Marx's Reprisals*)一书(该书中译本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同样声称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学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误解,认为苏东剧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失败,相反是马克思本人对他那些被误解了的思想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的一种“复仇”。而更早几年,托马斯·芒格出版了《共产主义的死亡与原本马克思主义的重生》一书(Thomas M. Mongar, *The Death of Communism and the Rebirth of Original Marxism*,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4),认为“共产主义的死亡”并没有埋葬马克思,相反,曾经被正统马克思主义遮蔽的“原本的马克思”的思想将获得新生。很显然,这是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中,试图通过“回到马克思”来“拯救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策略选择。为了辨识某种特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思想之间的差异,这种划界策略有时会产生非常奇特的效用。例如,19世纪70年代末,针对法国“马克思派”中存在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就曾毅然决然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类似的研究趋向在国内学界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而且时间并不明显晚于西方学界,因此很难说是对西方学界的简单照搬或移植,至多只能说是一种呼应。

单就哲学界的情况来看,随着“回到马克思”之说的兴起,国内不少学者都主张,应该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概念严格界划开来。如果从这两个概念所涵盖的内容范围和文

本依据来看,这种界划当然是合理的,也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和形态演变作出更具体的理解和描述。在这种界划中,“马克思哲学”在狭义上特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它以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为文本依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文本依据则不仅包括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包括了隶属于这一学派的其他人的著作,例如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的后继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甚至包括马克思的战友和学生的著作,理论上还应该包括当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是政治家还是学者)的著作,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在不断扩展的概念,而“马克思哲学”则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确定的概念。

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上述划界的意义,它就是一个单纯技术性 or 技巧性的问题了。实际上,主张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概念严格界划开来的论者,都暗含着一种前见: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与隶属于这个学派的其他人的哲学(如恩格斯的哲学、列宁的哲学、斯大林的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是有本质区别的。换言之,这种划界并不是一个技术性 or 技巧性问题,而是一个实质性问题。

然而,在我们看来,正是在这里可能潜藏着一个理论逻辑上的“陷阱”: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僵硬地界划开来,势必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甚至人为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后继者之间的种种“断裂”。排除那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的“偏见”不论,在理论上则关涉到如何看待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理解方式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质询的:“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是自足地存在于马克思

的文本中,还是存在于与现实实践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发明中?割断了马克思哲学与后来继承者的历史联系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如果说与马克思同时代且长期合作的恩格斯都对马克思存在着诸多‘误读’和‘曲解’,那身处当代的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回到马克思’,而这种‘还原’主义的理解进路是否本身就违背了当代诠释学所揭示的理解规律?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是理论本身的自治还是对当代现实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等等。”(参看马俊峰:《合理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9期)

这些尖锐的质询凸显了理解方式的当代性问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发源而不断流变着的学说,是以马克思为根而一直在生长着并具有分歧的枝杈的理论生命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与“流”抽象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而力图在源头去寻找“马克思哲学”自身的所谓同一性和单义性,只能是否定历史的错觉。实际上,即使是在源头上也存在着本身的差异和矛盾,孕育着多向发展的可能性,而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更是发展本身的特性所规定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在实践中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侧重点和着眼点都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质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家族。只有从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出发,才能合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正当地提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问题。

事实上,在当代新的境域下“重读马克思”,本身就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种不同路向:一种是强调马克思研究必须具有充分的文本根据,即“马克思文本研究”;一种是突出马克思思想

的当代性,即“马克思当代价值研究”。前者力图通过对文本的悉心解读,还原马克思当年思考的特定语境,弄清它的原始状态和思想实质,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后者虽然也把文本研究作为基础,但更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即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来捕获时代问题和激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当代的意义。这两种路向的差异,在它们的两个纲领性口号中得到了鲜明的表达:一个是“呈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原初状态”;一个是“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

我们认为,“马克思文本研究”与“马克思当代价值研究”并不构成互相对立的关系,它们只有在“问题意识”发生偏差时才可能出现某种外在“紧张”。因为从解释学视角看,任何理论和学说的意义都不仅孤立、静止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且还存在于以后对它的解释之中。因此,文本的意义永远是未完成的,解释敞开了文本意义通向未来的道路。正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解释,从文本“原有”的意义中不断开掘出其“应有”的意义,一种学说的价值才能发扬光大。

马克思的文本,自从它们被创作出来以后,已经过了几代人的解释,形成了若干互有差异的解释系统。这些解释系统构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马克思学说的各种衍生形态。今天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完全撇开“马克思主义”去“回到马克思”,否则只能是否定历史的错觉。这里存在着“源”与“流”、“一”与“多”的复杂关系。马克思的文本是马克思创作的,是马克思学说创立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作为整体来看是“一”;与之不同,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是由他人(包括同时代的其他人和后来人)进行的,因此它可以也必然是“多”。一般说来,对文本的解释要以文本本身为基础、为源头,必须尽可能达到与文本实质内容的一致。但是,这种“一

致”是一个无止境的无限的“对话”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本解释系统的各种衍生形态必然是多样化的,乃至是多元化的。这些多样化的形态之间可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可能形成竞争的关系。解释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我们称之为衍生文本。被解释的原初文本与解释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而是一种循环关系。文本的意义存在于并且只能现实地存在于对它的解释中,“多”和“流”是对“一”和“源”的补充和发展(包括添加,当然也包括偏离),现实中只能通过“多”和“流”去达到“一”和“源”,当然,这是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来实现的。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既不是要简单地重复或张扬历史上的某种解释,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在众多的解释中增加一个新的品牌或品种,而是为了带着当代的“问题意识”,通过新的解释,揭示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或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必须根据变化着的历史环境来反思和修正现存的思想范畴和理论假定。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理论实体主义,强调理论必须随着生活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它自身的定位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自我定位,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地从理论的角度来对待理论,而要把理论看作一种历史现象,按照理论所力图解释和改变的历史环境来看待理论。事实上,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自身的前提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思想体系,它既是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创造者,又是这种环境的产物。正因为此,邓小平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分析当今世界变化形势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

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①这段话,值得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深长思之。当然,对于那些试图把马克思变成某种“中立无害的偶像”的所谓研究者,是可以不必理会的。

应出版者的要求,我们把自己的一些看法简略表述如上,相信读者能够根据自己理解作出判断和选择。

杨学功

2008年3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